

试析南朝陵寝制度的两大取向

付龙腾¹

(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南朝陵寝制度建设大致有师古与任己两大取向，这于不同方面均有表现。陵墓石刻方面，有明暗两条线索表明其对汉晋文明进行了延袭，同时也以之为基础进行改造。墓葬形制与随葬品方面，从前朝制度获取灵感，并依丧葬观念的改变做出调整。壁画装饰方面，在特殊政治文化背景下于南朝初形成了“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壁画，却因时代的发展而于南朝末衰落并最终被陵寝制度体系所扬弃。

【关键词】：南朝 陵寝 石刻 墓葬形制 随葬品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壁画

【中图分类号】：K871.42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从未出现过断裂，但却绝对不是简单的历代叠加。这表现在制度建设方面，即是新制的建立势必要寻求前代经验与现实需求之间的平衡，也就是在师古与任己之间进行取舍。对于此，《宋书·礼志》开宗明义提到：任己而不师古，秦氏以之致亡，师古而不适用，王莽所以身灭^[1]。对立江左的南朝诸政权而言，如何处理二者之关系更显棘手。篡晋而立的刘宋急需与前代划清界限，这就需要在制度建设上任己而为；然而刘宋及后续政权又面临北方政权的压力，这种压力既来自军事，也来自政治文化，应对后者就需要师古以彰显自身之正朔。

南朝陵寝制度可谓上述局面的缩影。南朝的陵墓石刻、墓葬形制与随葬品、墓葬装饰等不同领域，于师古、任己两端各有取舍，这导致了各规制走向不同结局。因此，分析南朝陵寝制度所存在的师古与任己两大取向，可以为理解南朝政治文化之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对陵墓石刻的分析

南朝陵墓石刻呈现高度制度化的状态。首先，陵墓石刻基本组合形成石兽、石柱、石碑各 1 对的基础模式。其次，石刻的使用存在较为严格的等级区分。不同墓主所能使用石刻的种类、数量，是要大致依身份高低对基础模式进行增减；石兽分为有角麒麟和无角辟邪^[2]，使用者等级有明显界限——前者为皇帝专属，后者为王侯所用。萧梁时期，这种等级制度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然，这种等级规定形成的时间应该会更早一些，特别是考虑到齐代石兽已有了麒麟、辟邪之分。只是，宋、齐两代帝王对待宗室的态度比较残忍，能够善终者为数甚少。因此即便有葬制上的规定，几乎也是只能停留在纸面。当然，后文将要涉及的陵墓地下埋藏相关规制似乎也成熟于萧梁，多少也与此有关。

陵墓石刻的渊源，是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大致可分为外来说、本土说、本土起源兼受外来文化影响三类观点^[3]。笔者也无力定论陵墓石刻起源之初是否收到外来文明影响，但应当承认的是，考虑汉晋时期大量实物遗存与文献证据的存在，南朝陵墓石刻的直接渊源在于汉晋文明是毫无疑问的。当然，南朝陵墓石刻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自身独有的时代风尚。因此，可以说南朝陵墓石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师古与任己相结合的产物。这基本是学界共识。本文想要继续深入讨论的是，南朝陵墓石

¹作者简介：付龙腾（1988-），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2017 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汉唐考古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17ZDA216）阶段性成果。

刻师古于前代的细节可能比学界过往所认知的要稍复杂些。

本文认为，南朝陵墓石刻对前代的继承存在“明”“暗”两条线索。对汉晋地上石刻的直接沿袭是为明线。南朝陵墓神道石刻的组合方式在东汉初步形成，并于西晋时期形成相对固定的模式；而南朝石刻的造型也与汉晋石刻有密切关联，同时又结合当时文化环境进行了改造^[4]。上述这些现象已为很多学者关注，此处不再重复论证。本文这里所要补充的是，从制度层面考察，南朝陵墓石刻还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实现了使用者阶层的跃迁。汉晋时期，使用石刻的墓葬，墓主身份不会太高。《水经注》所记东汉石刻墓主明确的有：桂阳太守赵越墓^[5]、平阳侯相蔡昭墓^[6]、弘农太守张伯雅墓^[7]、太尉曹嵩墓^[8]、太傅掾桥载墓^[9]、太尉桥玄墓^[10]、安邑长尹俭墓^[11]、汉阳亭侯蔡瑁墓^[12]，以及包括司徒袁滂、蜀郡太守袁腾、博平令袁光在内的袁氏墓地^[13]等；再考察保留东汉石刻遗存较为集中的河南、四川、山东等地墓主明确者，有河南南阳宗资墓^[14]、山东嘉祥武氏墓群^[15]、四川雅安高颐墓^[16]等；文献与实物结合，基本可以认为使用石刻的墓主多为中高层官员或地方豪族^[17]。到了魏晋时期，情况更为单纯，由于最高统治者倡导“薄葬”，陵园地面设施高度简化，陵墓石刻自然只能在碑禁较为松弛之际为少数地方官员使用^[18]。因此可以说，石刻成为帝王陵墓規制是南朝对前代制度的改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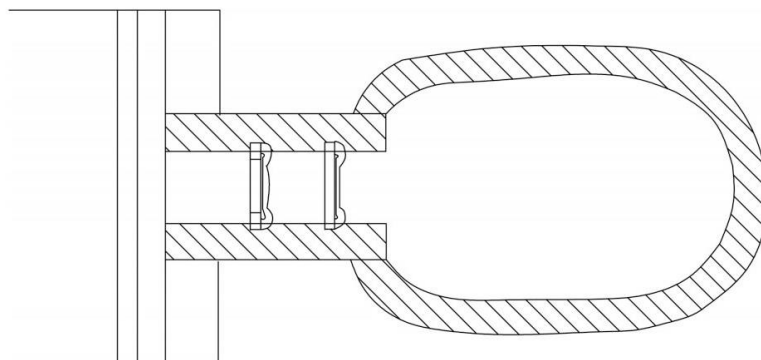
上述线索属于从“地上”到“地上”的直接沿袭，较易理解和接受。但是，南朝石刻对前代的沿袭还存在一条暗线，对这条线索的把握则需要师心独运，打破陵墓体系中“地上”与“地下”的隔阂。在漫长的魏晋“碑禁”时代，石碑、石柱偶有出现，但在后来南朝陵墓石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石兽却难寻踪迹。这也不难理解，如果说石碑、石柱出于标识墓葬的目的还可于禁令外有所通融的话，齐巧雄伟的地面石兽实在难以找到借口。《南齐书》载“骐驎及阙，形势甚巧，宋孝武于襄阳致之”^[19]，恐怕孝武帝当时看到的也是汉代古物。这样，石兽的形象经历至少两百多年的空缺后，突然间横空出世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姑且不说向来保守的丧葬礼制为何会对此高度容忍，单纯就工匠如何做到完美复古而言，已经难以解释，毕竟这绝对不是采访几处古物就可以做到的。那么，是否有线索将这两百多年的空缺进行填补呢？日本学者菊地雅彦为笔者提示了一条合理的研究路径。菊地雅彦指出，河南偃师杏园村34号西晋墓出有兽形帐座，其兽头的造型和南京麒麟铺石兽兽头之间有密切继承关系^[20]。可惜，这样的例子似乎只有一条，检索两晋墓葬所出龙首、虎首帷帐座，兽头造型与之均差距较大。另外，该例子的存在只能说明此种造型形式在汉代之后仍被人们了解，但帷帐座和陵墓石兽之间在丧葬观念上却没有明确联系。不过，菊地先生的研究启发我们，两晋时期地下墓葬内出土的文物可能是连接东汉、南朝石兽的桥梁。笔者认为，最有可能起到这一作用的就是两晋墓葬内的青瓷狮形器。对于这类器物的命名、功能，学界尚难达成一致，这里姑且使用仅客观描述其形状的青瓷狮形器这一命名。观察两晋墓葬内部分青瓷狮形器的造型可以发现，其两侧饰有羽翼，周身装饰卷曲状圆涡纹，胸前饰有鬃毛，这些特征均和南朝陵墓石刻有相似之处，参见图一中1和2的对比；甚至其眉部、尾部的造型也都与南朝石刻意匠相近，参见图一中3和4、5和6的对比^[21]。目前所知青瓷狮形器，集中出现于南京地区与宁绍平原周边地区，北方地区也有所发现，但一般认为其产地均在越窑。有学者结合出土材料与文献记载指出青瓷狮形器使用的下限至少到东晋中期^[22]。当然也不排除未来考古材料的增多其下限后移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结合青瓷狮形器在墓内的出土位置，有学者指出此类器物部分有驱邪避恶的作用^[23]，曾布川宽先生则指出南朝陵墓石兽有守护、辟邪的功能^[24]。因此，狮形器和南朝陵墓石刻不仅在造型装饰方面有联系，功能性质上亦有相通之处。当然，为了适应立于地上之用途，也为了满足孝武帝复现宏伟陵墓石刻的浪漫设想，工匠们将这种造型、装饰风格的物质载体从瓷器转变为石头。



图一//青瓷狮形器与陵墓石刻造型的对比

狮形器整体造型 石麒麟整体造型 狮形器头部 石麒麟头部 狮形器尾部 6. 石麒麟尾部（1 出土自浙江温州太平岭 2、6 为丹阳胡桥狮子湾石麒麟 3、5 为山东邹城刘宝墓出土狮形器 4 为丹阳胡桥仙塘湾石麒麟）

结合上述现象，似可推断汉代与南朝石兽的传承之间存在这样一条暗线：随着地上石兽受到限制，人们将其造型应用到了小巧的陶瓷器物上，这包括陶质帷帐座，更应包括集中出现于江南的青瓷狮形器，后者的使用至少要到东晋中期。至于刘宋中期，孝武帝受襄阳石刻启发产生了恢复地面石兽的浪漫想法。工匠们则很有可能直接参考生产于南方，并曾在前朝长期流行的青瓷狮形器的造型与装饰，转移其所在空间，转换其物质载体，最终制作出南朝陵墓石兽。并且，由于青瓷狮形器还和驱邪有关，这种“地下”到“地上”的转换在丧葬观念上也较易被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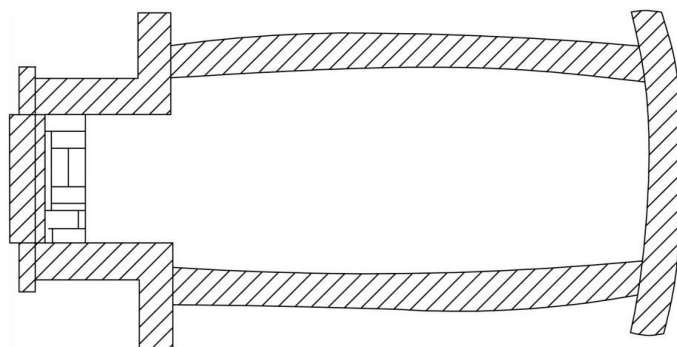


图二//西善桥油坊村墓平面形制

二、对墓葬形制与随葬品的分析

经过历年的考古发掘，笔者搜集到如下一些属于帝陵级别的南朝大墓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处：位于今江苏丹阳地区的胡桥仙塘湾墓（推定为齐景帝修安陵）^[25]、胡桥吴家村墓（推定为齐和帝恭安陵）、建山金家村墓（推定为萧宝卷墓或齐明帝兴安陵）^[26]，位于今南京地区的西善桥油坊村墓（推定为陈宣帝显宁陵）^[27]。新近发现的南京狮子冲 M1、M2，墓主分别被推定为昭明太子萧统及其生母丁贵嫔^[28]，二墓虽非帝陵，但墓主身份较高，至少可部分反映同时代的帝陵面貌。上述墓葬在墓葬形制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反映了南朝帝陵规制存在一些一以贯之的内容，包括：第一，墓葬规模方面，砖室全长基本在 13 米以上，其中仙塘湾大墓与狮子冲 M1、M2 都在 15 米左右。第二，墓葬的平面形状均为墓壁外弧的长椭圆形（图二）。第三，墓葬设施方面，墓室与墓坑之间多存在十条以上放射状的挡土墙，用以加固墓室；同时，墓前段的甬道内均设置有两道石门。需额外说明的是，推测为显宁陵的油坊村大墓在大致具有上述特征的同时，砖室全长仅有 10 米，墓室外侧的挡土墙也被省去，这或许说明南朝陵寝规制在末期有所松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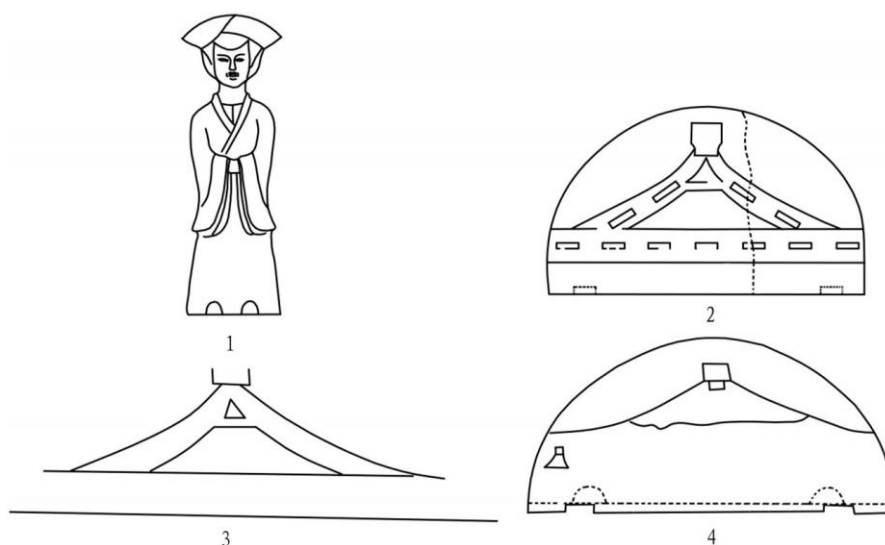
另外，考古工作者在南京甘家巷一带集中发现了一批萧梁宗王陵墓，其中桂阳王萧融夫妇合葬墓^[29]、桂阳王萧象墓^[30]二墓出有墓志，墓主明确。历代学者结合文献记载和陵墓地望进行考证，又有以下墓葬被推定属于宗王陵墓：甘家巷 M6（推测墓主为安成王萧秀）^[31]、尧化门老米荡墓（推测墓主为南平王萧伟或吴平侯萧景）^[32]、白龙山墓（推测墓主为临川王萧宏）^[33]、蔡家塘墓 M1（推测墓主为始兴王萧憺）^[34]等。这些宗王墓葬与帝陵存在一定的共性，包括平面亦呈长椭圆形，甬道设有石门等。但二者对比，可看出宗王与皇帝的葬制均存在明显的等级界限：第一，宗王墓全长多在 10 米上下，规模小于帝陵。第二，与帝陵甬道两道石门不同，宗王墓甬道只有一道石门。另外，宗王少见砖室外侧设置挡土墙者，少数例外如白龙山萧宏墓，是在墓室后壁外部设有两道极短的挡土墙，仅略具其意而已。



图三//吕家山李氏家族墓地 M1 平面形制图

由此，可以认为，南朝最高统治者皇帝、宗王阶层在墓葬形制上形成了特点明确、等级鲜明的规制。若将这些规制与东晋墓制对比，可窥见其于师古与任己两端之取舍。

有学者认为，南朝帝王陵墓近椭圆形的长方形墓室来源于苏南地域传统，东晋时期大部分北来士族与帝王、皇族基本不使用此类墓制；南朝帝王陵墓对此传统的采纳明显是对东晋的否定^[35]。但若检索东晋士族墓，能够发现不少采用此种墓制的例子：南京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墓地中的 M12（墓主温式之）墓室后壁微向外弧，M13 左、右、后三壁均为向外弧^[36]；南京吕家山东晋李氏家族墓地 M1（墓主李缉）左、右、后三壁外弧（图三），M2 平面形状亦与前者接近^[37]。这说明，墓壁外弧的平面长椭圆形墓室也是为东晋上层葬制所容纳的，只是东晋时期墓壁外弧程度不及南朝明显，这几乎可视为同一墓型因时代不同而产生的差异。因此，南朝采用此种墓形，大致还是不出东晋上层丧葬礼俗之范围。



图四//石子岗 M5、小村 M1 断代依据 M5M5：72. M1

1. 石子岗 M5 出土女俑（M5：7）
2. 狮子冲 M1 第一重石门叉手形制
3. 千佛崖中大通二年龕叉手形制
4. 小村 M1 石门叉手形制

至于甬道以墓门标识等级的做法，则是源自东晋葬制无疑，只是南朝时期将墓门材质由木质改为了石质。另外，东晋与南朝的大型墓葬均未见有设置挡土墙者，只是后者在力学结构上较前者更为合理，应该是在前者基础上进行改良后产生的。由此，南朝陵墓在墓葬形制方面基本是在师古的基础之上行若干任己之举。

随葬品方面的情况也大致如此。由于多数南朝大墓经过盗掘，随葬品组合已不完整，但仅就现有资料，仍能看出南朝陵墓在随葬品方面与前代规制的关系，可对由分析墓葬形制所得出的结论进行补充。首先，南朝大墓最明显的特点是对石质品的使用，其种类包括俑、马、帷帐座、镇墓兽、墓志等。这显然与东晋制度截然不同。但应该指出的是，上述种类的随葬品在东晋墓葬中并不少见，只是材质非石质，而是陶质，包括陶俑、陶帷帐座、镇墓兽、砖质墓志等。有学者分析，南朝大规模使用石制品是受到高句丽的影响^[38]。事实上，汉文化的丧葬文明中是存在用石传统的。巫鸿先生认为，在汉代人们已经开始将石头用于丧葬行为中，用以表达“永恒”的概念^[39]。东晋时期，多种迹象表明，很多士人将安葬南方视为临时行为，北方故土才是心心念念的长眠之地^[40]。到了南朝，随着北伐无望，这种观点不再流行。墓葬内呈现更多代表“永恒”的石质元素，正是这种观念转变，或刻意或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墓葬制度。墓葬形制方面，将东晋时期的木门改为石门应也与此有关。



图五//石子岗 M5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壁画砖使用情况

其次，尽管数量已经比较少，但墓葬内所见陶器仍与前代有关联。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老米荡萧伟墓^[41]内所出陶器器表均有涂朱现象。这种现象在西晋中原地区高等级墓葬中可以看到，比如河南偃师枕头山 M4、M5 内出土涂朱陶器碗、盘^[42]，河南孟津刘家井村西晋墓出土涂朱陶器耳杯、盘^[43]等，应是具有特殊含义的礼制器物。东晋时期南京地区的富贵山东晋墓^[44]、幕府山东晋墓^[45]、南大北园东晋墓^[46]，所出陶盘、耳杯亦有涂朱现象。南朝陵墓葬制与两晋之关联，由此可见一斑。

总体上，南朝陵墓在墓葬形制、随葬品方面基本是在沿用两晋制度基础上而又有所损益，也就是在师古基础上又多有任己之举。

三、对“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壁画的分析

与陵墓石刻、墓葬形制、随葬品等方面多少有师古之表现不同，南朝陵墓在墓葬装饰方面更多表现出任己的取向。这集中体现在，南朝陵墓结束两晋时期墓葬装饰之低潮，开创独具时代特色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壁画。故学界常认定装饰“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壁画为南朝帝王陵墓的时代特征。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现已近乎常识的认知其实只是一个大概印象，“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壁画作为新兴的墓葬规制，其流行年代与适用阶层本身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西善桥宫山大墓是解决“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壁画出现年代的关键材料^[47]。该墓墓内南北两壁装饰该题材壁画，据题记，南壁从前侧开始以此绘制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北壁从前侧开始则绘制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对于该墓年代的判定曾流行多种观点，且年代跨度较大。韦正先生对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的各项指标进行了逐一分析，指出该墓年代应在刘宋中后期^[48]。相比之下，这应该是最令人信服的结论。另外，从图像内容来看，一般认为宫山墓相关壁画最为完好地传达了粉本原貌^[49]。这至少也可旁证宫山墓的年代早于下文所述其他墓葬^[50]。故而据现有材料，“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壁画应迟于刘宋中晚期开始出现。宫山大墓的等级也值得讨论。虽然有学者推测其为刘宋帝陵，但该墓墓室全长只有 8.95 米，甬道只设有一道石门，级别明显低于帝陵，甚至不及一般宗王墓。故宫山大墓墓主身份不会太高，最多为王侯一级。由此可知，“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壁画产生之初，王侯一级的贵族成员是可以使用的。

南齐是该形式壁画进入帝陵制度的重要阶段。推测为南齐帝陵的丹阳鹤仙塍墓、金家村墓、吴家村墓三者墓壁均装饰“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壁画，并且在甬道、墓室内加入了其他题材，包括甬道内的狮子与守门武士，墓室两壁的羽人戏龙、羽人戏虎和由骑马武士、执戟侍卫、执伞盖侍从、骑马乐队组成的出行仪仗。图像保存较好的为金家村墓、吴家村墓，但二墓图像均有部分构图散乱、题记错误的现象。很多学者对此进行过分析，基本形成下述共识：金家村墓与宫山大墓的部分墓砖出自

同模，或是前者对后者进行了精细模仿、重新翻制；其余不同部分，则属于金家村墓自行补全^[51]。吴家村墓“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像则与宫山大墓内图像并无重合，应该是在参考金家村墓基础上重新制作了模具^[52]。总体来看，南齐对刘宋时期出现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壁画比较重视，对其进行了模仿与创新，并明确将其确立为帝陵规制的内容。

萧梁时期的情况则略显复杂。南京地区所发现萧梁宗王墓均未装饰“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壁画，而是使用简单图案的花纹砖，这或许令人怀疑萧梁时期该类壁画只有帝陵级别才可以使用。近年新发现的狮子冲 M1（墓主推测为昭明太子），墓内装饰有该类壁画，似乎进一步印证了上述推测。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因故未清理到墓底，但 M1 内的图像已呈现与宫山墓之间较大的差距，题记也有错乱，郑岩先生推测 M1 当属重新制作模具，但所能依据的原始资源相当有限，仅在构图和人物动态上与原作类似而已^[53]。另外，M1 墓壁还可见将模印图案的画像砖当作普通墓砖使用的现象。综合上述现象，狮子冲 M1 在制作画像砖时，人们对其图像原貌已不甚了解，使用也较为随意。

南京市雨花台区内的石子岗 M5^[54]、小村 M1^[55]可进一步说明问题。简报将二墓年代均定在南朝中晚期。若考虑二墓内出有常见于梁代中期以后墓葬的女侍俑^[56]（图四：1），再加上小村 M1 内石门叉手（图四：4）与狮子冲 M1（图四：2）、栖霞山千佛崖中大通二年（530 年）龕^[57]（图四：3）等所见萧梁时期叉手造型一致，将二者年代明确在萧梁时期是问题不大的。这其中，石子岗 M5 虽然使用了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等图像模印砖，但却将其与花纹砖混用，没能形成完整的画面（图五）。发掘简报认为：该墓出有帝陵中才有的壁画砖，墓主应该是南朝中晚期宗室中级别较高的人物。壁画没能完整拼镶，可能与墓主下葬时间仓促或其他变故有关。这种解释显然无法令人信服。首先，该墓全长不足 9 米，甬道内未设置石门，平面形状非长椭圆，而是常见于中型墓葬的凸字形。各种指标表明该墓墓主身份不会太高。第二，该墓墓前排水沟、墓室中砖砌棺床、墓壁直棂假窗与桃形龕均修建完整，所谓下葬仓促仅仅表现在非一日之功的拼镶壁画的装砌上，实在太过诡异。笔者认为，该墓葬修建者偶然获取了先前流行的模具或旧砖，但毕竟墓主身份不高，对于其拼镶方法、文化内涵恐怕知之甚少，才导致了这种现象的产生。再来看小村 M1，该墓甬道内虽然设有石门，但据墓坑推测墓室全长也只在 9 米左右，级别同样不高。该墓只是在封门墙处出土 5 块竹林七贤、龙、虎、狮子、天人题材的画像砖。可见小村 M1 在修建时是偶然获得了几块模印砖而混在墓内罢了。

帝陵级的狮子冲 M1 仍然使用“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壁画装饰墓壁，但已对这类题材的较早版本较为陌生，也不够重视。石子岗 M5、小村 M1 等级别不高的墓葬也可僭越使用该类装饰，甚至在对接拼镶方法了解甚少的情况下潦草使用。顶层葬制的忽视与下层葬制的僭越，充分说明流行于宋齐两代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在萧梁时期已名存实亡。

下面笔者尝试解释上述现象发生的原因。首先，这与齐梁易代之际的政策转向有关。中兴二年（502 年），大司马萧衍下令：凡东昏时浮费，自非可以习礼乐之容，缮甲兵之备者，余皆禁绝^[58]。这样规模宏大、工艺复杂的装饰，又与礼乐甲兵无关，自属中兴二年所禁绝之“浮费”。宋齐“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粉本、模具当受此打击，流传甚少，以至狮子冲 M1 想要重新制作时已很难获知其原貌。第二，这也与政治文化背景的变迁有关。韦正先生曾论及，竹林七贤等墓室壁画的出现属于刘宋皇室为掩饰出身自卑的附庸风雅之举^[59]。另有学者指出此种做法也有笼络士族之意^[60]。这些是南朝陵墓出现“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壁画的政治文化背景。而在齐梁之际，情景已大不相同，兰陵萧氏自身已有高度文化修养，呈现士族化趋势，士族也多乐意与之合作^[61]。由此，萧梁帝王已无需附庸风雅，也无需刻意笼络士族，故产生“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壁画的特殊政治文化背景已不复存在。

至于陈代，油坊村大墓墓内仅在甬道内装饰狮子拼镶壁画，墓室内已不见“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像。这一装饰题材最终退出了南朝帝王陵墓制度。

总之，作为南朝陵寝制度任己而为之的集中体现，“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壁画，是刘宋始创的陵墓新规制，并在南齐得到了发展。但毕竟产生于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下，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其在萧梁时期衰落，并最终结束于陈代。

四、结语

南朝陵寝制度建设大致有师古与任己两端。陵墓石刻方面，合理继承了汉晋制度并随时宜而改造，最终形成贯穿南朝的体系，后又对隋唐文明有所影响。墓葬形制与随葬品方面，从前朝制度获取灵感，并依丧葬观念的改变做出调整。这也使得相关规制至少得以贯穿整个南朝。墓葬装饰方面，出于特殊政治心态任己而为，形成“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壁画，最终却只能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化而销声匿迹。

从不同制度之结局不难看出，师古但不泥古，任己却不妄为，才是制度建设之不二法门。这对古今之政策制度制定当都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南朝梁·沈约：《宋书》卷十四《礼志一》，中华书局 1974，第 327 页。

[2]对于石兽名称的讨论还存在较多争议。邵磊《对南朝陵墓神道石刻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0 年第 1 期）一文对相关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详细梳理。本文暂统一将帝陵前有角石兽称为麒麟、王侯墓前无角石兽称为辟邪。

[3]一文化现象是独立起源还是受外来影响，有时不仅是学术讨论，还关乎当时政治局势。不同时代学者对南朝陵墓石刻渊源的研究也难免打下时代的烙印。章孔畅把研究者分为四代，可大致反映随时代变化学人立足点和心态的不同，参见氏著《南朝陵墓石刻渊源与传流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第 50-51 页。

[4]杨晓春：《南朝陵墓神道石刻渊源研究》，《考古》2006 年第 8 期。

[5]北魏·酈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九《清水》，中华书局 2007 年，第 226 页。

[6]同[5]，卷二十二《颍水》，第 517 页。

[7]同[5]，卷二十二《洧水》，第 518 页。

[8]同[5]，卷二十三《阴沟水》，第 553 页。

[9]同[5]，卷二十三《汭水》，第 558 页。

[10]同[5]，卷二十四《睢水》，第 569 页。

[11]同[5]，卷三十一《泄水》，第 724 页。

[12]同[5]，卷二十八《沔水》，第 665 页。

[13]同[5]，卷二十三《阴沟水》，第 551 页。

[14]林通雁：《中国陵墓雕塑全集：东汉三国卷》，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9 年，图版 35。

[15]蒋英炬、吴文琪：《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山东美术出版社 1995 年。

[16]耿继斌：《高颐阙》，《文物》1981年第10期。

[17]西汉时期，冠军侯、骠骑将军霍去病墓前设置有石刻，但由于霍墓“为冢祁连山”以及“马踏匈奴”石刻的性质，笔者将其视为偶然出现的“记功”式石刻（王子云：《西汉霍去病墓石刻》，《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1期），这与中古时期与丧葬仪礼密切相关的陵墓石刻不属于同一范畴。东汉时期也有两例例外：1.《水经注·易水》载中山简王刘焉墓时提到“陵隧碑兽并出此山，有所遗留二石虎，后人因以名冈”。2.《水经注·阴沟水》记谯郡城南曹嵩冢以北有石碑、石马时，认为其“石作粗拙，不匹光武隧道所表象马也”；同时，洛阳象庄出土石象1件，常被认为与光武帝陵有关。且不说上述记载是否完全可靠，陵前设置石象、石马、石虎的做法也不见于其他东汉帝陵、诸侯王墓，当视为少数特例，非汉制常态。这和南朝时期的情形大有不同。因此，本文此处的结论还是大致可靠的。

[18]刘涛：《魏晋南北朝的禁碑与立碑》，《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3期。

[19]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二十二《豫章文献王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414页。

[20][日]菊地雅彦：《南朝石兽与东汉石兽比较研究》，《四川文物》2014年第1期。

[21]图片来源：1 采自曹锦炎、深岳明、郑嘉励编《中国出土瓷器全集9·浙江卷》，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60页；2、4、6采自南京博物院编《南朝陵墓雕刻艺术》，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5、33、16页；3、5由馆藏单位邹城博物馆提供。

[22]陈杰、石荣传：《两晋带背筒狮形器的用途及定名问题》，《四川文物》2008年第3期。

[23]牟宝蕾：《关于西晋青瓷狮形器的思考》，《东方博物》第六十九辑。

[24][日]曾布川宽著、傅江译：《六朝帝陵——以石兽和砖画为中心》，南京出版社2004年，第71页。

[25]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及砖刻壁画》，《文物》1974年第2期。该墓墓主推定见[日]曾布川宽著、傅江译《六朝帝陵——以石兽和砖画为中心》，第26页。

[26]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县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文物》1980年第2期。简报将二墓墓主分别推定为齐和帝萧宝融和东昏侯萧宝卷；曾布川宽对建山金家村墓墓主有不同看法，推定其为齐明帝萧鸾，见[日]曾布川宽著、傅江译《六朝帝陵——以石兽和砖画为中心》，第27页。

[27]罗宗真：《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发掘》，《考古》1963年第6期。

[28]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栖霞狮子冲南朝大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5年第4期。

[29]南京市博物馆、阮国林：《南京桂阳王萧融夫妇合葬墓》，《文物》1981年第12期。

[30]南京博物院：《梁朝桂阳王萧象墓》，《文物》1990年第8期。

[31]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栖霞山甘家巷六朝墓群》，《考古》1976年第5期。简报正文记M6为萧秀墓，附录却记M4为萧秀墓，现以正文为准。

[32]南京博物院：《南京尧化门南朝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2期。简报推定墓主为萧伟，王志高先生考证墓主为萧景（见《南京尧化门外北家边南朝陵墓神道石刻墓主身份新证》，《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33]南京市博物馆、栖霞区文管会：《江苏南京市白龙山南朝墓》，《考古》1998年第8期。

[34]金琦：《南京甘家巷和童家山六朝墓》，《考古》1963年第6期。墓主推测见蒋赞初先生《关于长江下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断代问题》（见氏著《长江中下游历史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74-84页）。

[35][韩]赵胤宰、韦正：《南朝陵寝制度之渊源》，《古代文明》2005年第4卷。

[36]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墓》，《考古》2008年第6期。

[37]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吕家山东晋李氏家族墓》，《文物》2000年第7期。

[38]倪润安：《南北朝墓葬文化的正统争夺》，《考古》2013年第12期。

[39][美]巫鸿著，李清泉、郑岩等译：《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的“纪念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9页。

[40]安然：《魂返故土还是寄托异乡——从墓葬和墓志看东晋的流徙士族》，《东南文化》2002年第9期。

[41]南京博物院：《南京尧化门南朝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2期。

[4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西晋帝陵勘察记》，《考古》1984年第12期。

[43]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孟津县刘家井村西晋墓的发掘》，《考古》2014年第10期。

[44]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玄武区文化局：《江苏南京市富贵山六朝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8期。

[45]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幕府山东晋墓》，《文物》1990年第8期。

[46]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文物》1973年第4期。

[47]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及其砖刻壁画》，《文物》1960年第8、9期合刊。

[48]韦正：《南京西善桥宫山“竹林七贤”壁画墓的时代》，《文物》2005年4期。

[49]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增订版）》，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303页。

[50]曾布川宽先生对此看法不同，认为宫山墓年代晚于几座齐代帝陵，只是掌握了更好、更完整的粉本（见傅江译《六朝帝陵——以石兽和砖画为中心》，南京出版社2004年，第126页）。从逻辑上看这倒也有成立的可能，但流传过程未免太过曲折，在缺乏足够证据的情况下需谨慎对待。

[51]王汉：《论丹阳金家村南朝墓竹林七贤壁画的承前启后》，《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3期。

[52]同[49]，第 305 页。

[53]同[49]，第 305 页。

[54]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雨花台区文化局：《南京雨花台石子岗南朝砖印壁画墓（M5）发掘简报》，《文物》2014 年第 5 期。

[55]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小村南朝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5 年第 2 期。

[56]韦正：《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第 214 页。

[57]贺云翱：《南京独龙阜东出土南朝石塔构件的初步研究》，《华夏考古》2010 年第 4 期。

[58]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五《梁纪一·高祖武皇帝·天监元年》，中华书局 1956 年，第 4512 页。

[59]同[35]。

[60]李若晴：《再谈“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成因——以刘宋初期陵寝制度与立国形势为中心》，《艺术探索》2017 年第 31 卷第 1 期。

[61]赵直：《南朝皇权与士族》，四川师范大学 2016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39-40 页。